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Farming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and Thailand——A Case Study of Gusheng Village in Dali City

Shi Dongqi¹, Jin Luoyi^{2,*}

¹Foreign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Office,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²Academic Affairs Office, 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Kunming, China

Email address:

102875482@qq.com (Jin Luoyi)

*Corresponding author

To cite this article:

Shi Dongqi, Jin Luoyi. (2025).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Farming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and Thailand——A Case Study of Gusheng Village in Dali City. *Science Innovation*, 13(4), 100-106. <https://doi.org/10.11648/j.si.20251304.18>

Received: 8 July 2025; Accepted: 28 July 2025; Published: 20 August 2025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Gusheng Village in Dali City, Yunnan Province, China, as its core case. By comparativel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models of integrating farming culture and tourism in China and Thailand, it explores innovative pathway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agriculture, culture, and tourism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Gusheng Village has achiev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a traditional fishing village to a cultural tourism destination through a trinity model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Thailand, meanwhile, leverages the strategy of "Smart Agriculture Landscape + Handicraft Branding" to convert farming traditions into tourism attractions. Building on the experiences of both loc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pathway of "Policy Support -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 Industrial Chain Extension," provid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imilar rural areas. The study further validates the economic value transformation potential of farming culture in rural tourism, contributing Chinese approaches and Southeast Asian insights to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lakeside communities.

Keywords: Agritourism, Agri-cultural-tourism Integratio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Gusheng Village, Thai Villag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泰农耕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研究 ——以大理市古生村为例

施东琦¹, 金罗艺^{2,*}

¹云南农业大学对外合作交流处, 昆明, 中国

²云南农业大学教务处, 昆明, 中国

邮箱

102875482@qq.com (金罗艺)

摘要: 本研究以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为核心案例, 通过对比分析中泰两国在农耕文化与旅游融合领域的实践模式, 探索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文旅融合的创新路径。研究发现: 古生村通过“生态保护-文化活化-科技赋能”三位一体模式, 实现了从传统渔村到文化旅居目的地的转型; 泰国则凭借“智慧农业景观化+手工艺品牌化”策略, 将农耕传统转化为旅游吸引力。基于两地经验, 本文提出“政策保障-社区参与-技术赋能-产业链延伸”四维路径, 为同类型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农耕文化在乡村旅游中的经济价值转化潜力，为全球湖泊社区转型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东南亚智慧。

关键词：农耕文化旅游，农文旅融合，社区参与，古生村，泰国乡村，可持续发展

1. 引言

农耕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在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下，其保护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不断推进，农耕文化正通过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迎来了创造性转化与活化发展的新契机。尤其是在生态保护约束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文化旅游实现农耕文明的再生与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学界与政策实践高度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与泰国作为亚洲农业文明的代表国家，近年来在探索农耕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路径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中国云南省大理市古生村与泰国北部如清迈、清莱等地的乡村，便是典型案例。这些地区在保持生态本底的同时，积极发展以本土农耕文化为核心的旅游项目，实现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有机统一。

古生村位于大理洱海西岸，是一个拥有上千年历史的白族传统村落，曾长期以渔业为主要生计方式。然而，自2017年洱海生态保护“划定三条红线”政策实施以来，村庄的渔业活动受到严格限制，渔业收入锐减90%以上，迫使村民重新思考经济出路。在生态红线与产业转型的双重压力下，古生村依托其独特的农耕文化、白族建筑、传统手工艺及洱海自然景观，逐步走上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近年来，该村通过发展生态民宿、农事体验、非遗展示等方式，不仅带动了村民的就业与收入，也重构了村庄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凝聚力。[1]

与此同时，泰国在农业旅游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尤其在清迈和清莱等北部山区，形成了一批以稻田艺术、智慧农业、民族文化体验为核心的“创意农业旅游区”。通过引入设计美学、现代科技与在地文化，泰国成功将传统农业空间转化为集生态教育、休闲观光、文化传播于一体的新型旅游场所。例如，仅2024年上半年，清迈地区的农业主题农场接待游客就超过6万人次，实现了农业产值与旅游收入的双增长。这一模式不仅为当地小农经济注入了活力，也推动了农村青年返乡创业、老龄农民收入增加以及社区治理机制的优化。

本研究以古生村为核心案例，结合泰国清迈等地的实践经验，旨在开展一项中泰农耕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比较研究，探索其内在机制与发展路径。研究将重点聚焦以下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在生态环境保护压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农耕文化资源如何通过旅游实现其经济与文化价值的有效转化？第二，社区成员在农文旅融合中的参与机制如何设计，才能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效益的双赢？第三，中泰两国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在治理机制、利益分配、文化再生产等方面存在何种异同，对中国西部尤其是湖泊周边乡村的转型升级有何可借鉴之处？[2]

研究方法上，本论文将结合实地调研、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以及政策文本分析等方式，构建“资源—机制—路径”分析框架，从资源禀赋、治理结构、文化表现与市场机制四个维度，系统梳理古生村的转型路径，并与泰国模式进行对比分析。通过中泰案例的互鉴，本研究不仅回应了农耕文化可持续利用的全球性议题，也试图提出一套兼顾生态保护、文化复兴与社区利益的融合发展模型，进而为全球类似湖泊型社区的绿色转型提供可复制的“中国样本”与“东南亚智慧”。

在后疫情时代，文化旅游作为促进社会恢复、激活乡村经济的重要动力，其深层逻辑已不再局限于“资源消费”，而是转向“文化再造”与“社区共建”。正因如此，中泰两国的农耕文化旅游融合实践，不仅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切实路径，也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本土性、文化性与创新性的有力支撑。[3]

2. 中泰农耕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理论基础与比较分析

2.1. 农耕文化与旅游融合的理论框架

农耕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建立在资源系统化整合与体验场景重构的双重基础上。从产业融合视角看，旅游业通过产业链延伸将传统农耕活动转化为消费场景，实现三次产业的协同增值。文化资本理论则强调，地方性农耕知识、节庆习俗、生态观念等非物质要素可通过旅游场域实现“资本化转换”。在这一过程中，社区参与度、文化真实性和生态可持续性构成评价融合质量的三大核心维度。

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文旅融合”被赋予产业振兴与文化复兴的双重使命。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提升乡村旅游特色化、精品化、规范化水平”。[4]泰国则将“基于自然的旅游活动（Nature-based Tourism）”作为乡村旅游发展主轴，强调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社区受益的有机统一。两国的政策导向虽各有侧重，但均指向农耕文化资源的系统性价值转化。

2.2. 中泰发展特征对比

中国乡村依托政策驱动与科技赋能，形成规模化农文旅综合体。以云南为例，全省规划建设1000个乡村旅游示范村，2023年1-10月接待游客4.54亿人次，实现收入2278.6亿元，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136.95%。[5]泰国则更注重市场创新与文化品牌建设，如清莱稻田艺术项目通过GPS定位种植彩色稻苗，形成猫抱鱼等立体图案，吸引游客付费观赏，带动周边农产品溢价销售。这种发展差异根植于两国不同的资源禀赋与制度环境。

表1 中泰农耕旅游发展特征对比。

维度	中国模式（以云南为代表）	泰国模式
资源禀赋	多元民族文化（25个世居少数民族）、梯田景观、高原湖泊	热带农业景观、佛教文化、手工艺传统
政策驱动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农文旅融合示范村建设	皇太后基金会支持、社区自助旅游政策
核心特色	科技小院赋能（如古生村17个小院）、政策引导	创意农业（稻田画）、手工艺品牌化
社区参与	“企业+村集体+农户”契约化合作（石林县）	村民合作社自主运营（黎敦山项目）
典型挑战	同质化竞争、淡旺季明显、人才外流	国际游客依赖、产业链薄弱

中国乡村如古生村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产业同质化、季节性波动与人才断层。全村53户因洱海环保拆迁，损失房屋面积6100m²，但补偿机制尚不完善；熟练掌握木雕、银器制作的工匠平均年龄达55岁，年轻劳动力外流导致“非遗传承链”断裂。^[6]泰国则受制于国际市场波动与产业链整合不足，如清迈农场过度依赖游客现场消费，农产品深加工与电商渠道建设滞后。

3. 古生村农耕文化与旅游融合的实践探索

3.1. 生态约束下的转型路径

古生村的转型始于洱海生态治理的刚性约束。2017年“三条红线”政策实施后，传统渔业收入下降90%，种大蒜、养鱼等辅助生计也被叫停。面对人均耕地仅0.8亩的资源困境，村民被迫寻找替代产业。研究团队负责人对此形容：“就像突然被剪断脐带”。^[6]转机出现在2015年——游客量激增让村民发现，那些百年木屋比渔船更值钱。

古生村创新性地将物理资产转化为文化资本：全村87栋传统木屋中，56栋仍有人居住，13栋改造为民宿，18栋空置房被激活利用。一户村民将木屋隔出三间客房，年租金收入3万元；女儿为游客提供白族妆造摄影服务，全

家年收入超10万元。木屋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成为村民的“生态银行”，实现了从渔业依赖到文化旅居的产业嬗变。

3.2. 科技赋能与文化活化

古生村农耕旅游发展的核心引擎是“科技小院”网络。2022年以来，中国农业大学联合云南农大在村内设立工作站，引入20家机构、200多名科研人员，形成17个科技小院集群，涵盖“人文科技小院”“乡愁科技小院”“云茶科技小院”等多元主题。这些机构不仅指导生态种植，更通过三大路径赋能旅游发展：

景观功能拓展：将稻田转化为景观带，策划“白族对歌节”“火把节”等农事节庆。参与文化表演的村民月增收超3000元，相当于过去种3亩水稻的收益。

文化IP打造：依托徐霞客历史足迹（1638年游历大理），2024年7月建成“徐霞客研学游基地”，融合农耕文化、白族三道茶、太华茶等元素，开发主题研学线路。基地联动云南农垦“云啡”品牌咖啡，筹建“徐霞客主题咖啡·茶舍”，展示徐霞客在大理10个县市的旅行路线与文物古迹。^[7]

社区福利创新：2025年启动“幸福大食堂”项目，为80岁以上老人免费供餐，60-80岁老人提供5元低价餐，科技小院学生享受12元四菜一汤。项目以“有机食材+中医养生+白族风味”为特色，构建“农业种植-餐饮服务-健康管理”全链条模式。

表2 古生村传统生计方式与旅游转型后对比。

生计要素	传统模式（2017年前）	旅游驱动模式（2025年）
核心资源	渔船、渔网、耕地	传统木屋、非遗技艺、农田景观
收入来源	渔业（占90%）、大蒜种植	民宿（20家）、文化表演、农产品加工
参与主体	本地渔民、农民	返乡青年（56人）、科技团队、企业
产业风险	生态退化、市场波动	淡旺季差异（民宿收入差达10倍）
文化传承	代际口传、家庭传承	研学基地、非遗工坊、节庆展演

3.3. 运营机制与利益分配

古生村采用“三元联动”运营架构：政府提供政策与土地支持，企业负责资金投入与市场运营，村民通过资源入股与劳务参与获益。云南金顺鸿旅游开发公司与洱海人文科技小院合作，推动“古生宴”项目市场化运作。该项目历经三阶段演化：

自发探索期（2023年7月-2024年3月）：小院自主试餐白族餐饮接待；

村民共创期（2024年3月-7月）：培训村民参与菜品研发与服务；

市场运作期（2024年7月至今）：企业介入品牌推广，累计接待4000余人，媒体曝光11次，为村民增收12万元。

在利益分配上，村集体以闲置资产入股享受分红，农户通过民宿经营、手工艺销售、文化展演等获取收益。然

而挑战依然存在：2022年全村76%村民仍依赖外出打工，20家民宿的旅游收入呈现“看天吃饭”特征——某网红民宿旺季月入5万元，淡季骤降至3000元。此外，仅有56人返乡创业，不足全村人口3%，人才断层制约可持续发展。

4. 泰国农耕旅游发展经验与启示

4.1. 创意农业与智慧旅游融合

泰国通过“农业景观化”与“技术体验化”策略，将传统农耕转化为高附加值旅游产品。清莱Ban Khon Sung村的稻田艺术项目，农民Tanyapong Jaikham利用GPS定位种植不同颜色稻苗，在田间“绘制”出猫抱鱼的立体图案。随着作物生长，图案色彩动态变化，成为社交媒体传播热点。该项目配套建设观景塔、研学工坊，吸引游客付费参观，

将农田从生产空间转变为审美空间与教育空间。这种创意农业不仅提升土地单位产值，更强化了泰国“水中有鱼，田里有稻”的传统生态价值观。

智慧农业技术的旅游化应用是另一亮点。清迈农场引入传感器与智能灌溉系统，游客可通过APP参与虚拟种植，线下采摘自己“云养护”的农产品。^[8]大城府则将传统水稻种植与历史遗迹结合，开发“稻田中的吴哥窟”体验项目。这些实践表明，技术可视化与过程可参与是农耕旅游成功的关键。

4.2. 社区自主运营机制

泰国黎敦山发展项目（Doi Tung Development Project）提供了一种“自上而下规划，自下而上运营”的社区参与模式。该项目由诗纳卡琳皇太后于1986年发起，旨在替代金三角地区的罂粟种植。项目覆盖清莱省27个村庄、10359人，分三个阶段实施：基础设施改（1988-1993）、生态系统恢复与经济作物推广（1994-2002）、村民自治能力建设（2002-2017）。

项目核心机制包括：

在泰国北部著名的山区社区——黎敦山（Doi Tung），当地政府与王室基金会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成功探索出一套“品牌共建、股份合作与梯级培训”相融合的乡村振兴模式，为曾经的毒品种植区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与国际认可。

首先，在品牌建设方面，黎敦山注册了“Doi Tung”这一具有民族文化内涵的手工艺品牌，系统整合泰北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通过品牌化、市场化手段推动地方产品走向高端市场。项目聘请来自意大利、法国、日本等国的国际知名设计师，与当地村民联合研发产品，涵盖纺织、陶瓷、家居饰品等多个品类。这一策略不仅提升了产品的艺术价值与市场竞争力，还显著实现了经济上的“文化溢价”——产品售价普遍比传统手工品高出30%-50%，成为泰国文创农产品出口的重要代表。

其次，在合作机制方面，当地推行村民入股制，以土地资源与劳动力形式加入合作社，转变过去单一依靠工资的收入模式。村民在参与种植、加工、销售各环节的同时，还可享受年度利润分红和涵盖医疗、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障福利，从而增强了社区成员的主人翁意识与长期参与的积极性。这种股份合作机制有效打破了“输血式”帮扶的短效局限，构建了可持续、内生化的“造血型”发展体系。^[9]

此外，为保障文化遗产与人才梯度建设，黎敦山设立了“皇太后手工艺学院”（Doi Tung Development Academy），实行初、中、高三级技能培养制度，系统传承泰北民族手工艺，包括纺织、刺绣、陶艺、金属工艺等，并开设设计、美学、管理等课程，培养既懂技艺又具市场意识的新生代工匠。这种“文化+技能”的复合型培训机制，不仅提升了村民的就业能力，也为区域文创产业注入了持久活力。

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黎敦山已从毒品泛滥、生态退化的高危地区，成功转型为联合国认证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典范。到2019年，该地区接待游客超过62万人次，旅游收入持续增长，居民人均收入较项目初期提升15倍以上。黎敦山模式不仅为泰国北部山区的乡村发展提供了范例，也为包括中国西部在内的类似生态脆弱区域，提供了可借鉴的转型路径与发展智慧。这种模式使黎敦山从毒品种植区转型为联合国认证的可持续发展社区，2019年接待游客62万人次，居民收入较项目初期增长15倍。

这种模式使黎敦山从毒品种植区转型为联合国认证的可持续发展社区，2019年接待游客62万人次，居民收入较项目初期增长15倍。

4.3. 政策与市场协同

泰国农耕旅游的政策环境体现为“双轮驱动”：国家旅游局的“神奇泰国”（Amazing Thailand）计划提供全球营销支持，农业与合作社部的“一村一品”（OTOP）政策赋能社区产品开发。地方政府则通过减税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农场改造，如清迈府对采用智能农业技术的农场给予30%设备补贴。

表3 泰国代表性农耕旅游项目及其特色。

项目名称	所在地	核心活动	社区受益方式
稻田艺术计划	清莱Ban Khon Sung	GPS稻田画、观景塔、作物科普	门票分成（农户占60%）
黎敦山发展项目	清莱Doi Tung	手工艺工坊、咖啡种植园、生态步道	合作社分红、社保计划
大城府历史农场	大城府	古法水稻种植、传统美食体验	农产品溢价销售
清迈智慧农场	清迈	物联网种植、采摘体验、农田宴	就业岗位、技能培训

5. 中泰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

5.1. 生态与文化协同发展模式

基于中国大理古生村的转型实践与泰国黎敦山等地的成功经验，本文提出构建“农耕为基、文化为魂、科技为脉”的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模式。该模式强调以农耕资源为基础，以本土文化为核心驱动力，并融合现代科技手段，推动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与旅游经济的多元共生。在洱海流域等生态敏感区域，尤可借助“三区协同”空间布局理念，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动态平衡与统筹规划：

生态保护区：针对禁渔区、湿地等敏感生态区域，倡导发展虚拟现实（VR）技术打造“云游洱海”沉浸式体验。

通过数字化影像、远程导览与智能解说，不仅有效规避对自然生态的干扰，还能满足游客对生态风貌的好奇与探索欲，实现“看得见的保护、参与式的教育”。^[10]

文化核心区：以白族传统木构建筑群为空间载体，整合扎染、银器锻造、剪纸、陶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设集展示、体验、创作、销售为一体的非遗工坊集群。借助文创设计与市场机制，使本土手工技艺得以“活态传承”，并成为游客深度参与和情感链接的重要媒介。

农业体验区：依托绿色生态农业优势，将稻田、茶园等自然耕作景观转化为研学教育基地和艺术创作场所。借鉴泰国清迈稻田艺术和智慧农业项目经验，结合中国传统农耕节气与乡土童谣，开展插秧节、收稻节等互动项目，构建“农业+教育+旅游”三维融合的体验型空间。

在云南石林彝族自治县的“四季村晚”实践中,上述模式已初见成效。该项目巧妙地将生态茶园景观与彝族传统歌舞表演相结合,构建起以季节为线索、以农事为载体的文化展演体系,不仅丰富了游客的文化体验,也增强了本地社区的文化自信与参与感。数据显示,“四季村晚”系列活动吸引了超过6万人次游客参与,有效带动了周边农特产品销售额提升30%以上,形成了“生态美、文化兴、百姓富”的良性循环。

总的来看,“三区协同”不仅为洱海流域这样的生态敏感区域提供了差异化发展思路,也为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类似生态社区的可持续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综合范式。未来,可在政策支持、数字基础设施、社区共建机制等方面加大投入,进一步强化生态价值的产业转化路径,实现“以文化润生态,以生态促发展”的共赢格局。

5.2. 数字技术赋能全链升级

数字技术可破解淡旺季失衡与产业链短板:

数字技术的介入,正成为破解乡村旅游“淡旺季失衡”“产业链短板”等顽疾的关键抓手。特别是在生态敏感、文化资源富集但承载能力有限的区域,如大理古生村,通过构建“源数字化—管理智能化—营销精准化”的数字赋能路径,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旅游系统的弹性与可持续性。^[11]

数字化方面,可建立涵盖古生村传统木屋建筑群、白族非遗技艺等核心资源的三维数据库,对村落空间结构与文化资产进行数字存档与模型复刻。在此基础上,开发虚拟现实(VR)与增强现实(AR)应用,建设“虚拟民宿预订系统”,使游客可在线探索客房风貌、文化氛围与景观位置,提升旅游前置体验与订单转化率,并减轻高峰期现场接待压力。

管理智能化方面,可依托云南省已建立的“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监管体系,集成智能监测设备和数据分析模型,对古生村及周边区域的游客流量、交通负荷、空气水质、噪声扰动等进行动态评估。通过智能预警机制和AI调度系统,优化人流引导与资源配置,确保生态环境不因过度旅游而退化,实现“智慧旅游、绿色监管”。

营销精准化方面,应充分运用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与大数据分析工具,打造“古生宴”IP矩阵。结合白族饮食文化、传统节令与洱海夜景,创新推出“洱海月下·长街宴”等沉浸式美食场景,借鉴泰国清迈稻田宴经验,通过灯光、音乐、服饰与互动表演,提升游客的文化沉浸感与情感认同,推动“内容即传播、场景即产品”的全域营销模式。^[12]

泰国清迈的实践进一步验证了“技术+文化”深度融合的重要性。例如,清迈农场引入物联网传感器监测土壤湿度、光照、作物长势等数据,生成“作物健康报告”,并巧妙地将这些农业参数转化为游客参与的“农场养成游戏”界面。游客可根据作物状态进行“互动养护”,参与采摘、命名、打卡等任务,极大增强了体验感与归属感。据统计,该互动式创新使得清迈农场的回访率提高了45%,并带动周边住宿、文创、农产消费实现协同增长。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并非简单的技术嫁接,而应成为激活文化资源、优化管理体系与重塑游客体验的内在驱动力。在古生村乃至更广泛的中国西部乡村振兴实践中,需将技术嵌入到地方文化肌理之中,形成“数据感知—场

景重构—体验提升”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5.3. 政策保障与利益共享

在推动农耕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政策设计应紧扣“权益明晰”与“能力建设”两大核心,构建起公平、可持续、具备地方适应性的社区治理体系。明确产权关系、提升社区能力、规范市场秩序,是确保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经济收益三者协调共进的关键保障。

在土地机制方面,可借鉴云南石林县矣美堵村的实践经验,推广“资源变资产、村民变股东”的合作共建模式。具体而言,村民将闲置房屋、院落、空地等以实物形式入股,由村集体统一规划与运营,如统一改造为嵌入式生态民宿、文创工坊等旅游设施。该模式不仅激活了沉睡资源,也增强了村民参与的积极性与项目的持续性,破解了“单一租赁、收益不稳”的传统难题,实现了集体与个体的利益捆绑与风险共担。

在人才培育方面,建议设立“白族工匠奖学金”,以支持年轻一代投身非遗技艺学习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借鉴泰国Doi Tung发展项目中“皇太后手工艺学院”的分级培训体系,可在白族传统村落中开设“文化技艺传承人培训中心”,结合现代设计理念与电商运营课程,形成“传统+创意+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培养路径,推动非遗技艺从“活下来”到“活起来”。

在风险防控方面,应严格执行《云南省旅居发展正负面清单(试行)》中关于农村旅居产业发展的第十条内容,特别是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虚假宣传和非法众筹开发项目。建议在村级合作社设立审计委员会和法律顾问机制,建立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并加强对社会资本进入乡村文旅领域的信用审核与运营监督,防止“伪共享”“变相圈地”等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发生。

在利益分配机制设计方面,构建“保底收益+集体分红+社区福利”三重保障结构,^[13]有助于实现公平可持续的共赢局面。具体做法如下:

保底收益:村民通过土地、房屋等资源入股,获得固定年租金或保底回报。例如古生村木屋年租金约为3万元,确保基本收益稳定。

集体分红:旅游项目盈利后,将30%的净利润统一纳入村集体收益分红池,按出资比例或劳务贡献进行年度分配,增强集体经济造血能力。

社区福利:部分收益用于社区公共服务与保障项目建设,如设立“幸福大食堂”,为老年人和困难群体提供免费餐食,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幸福感。

总之,通过明晰资源权属、完善合作机制、强化人才支撑与健全风控体系,配套多元化、可持续的收益分配模式,方能真正实现“让资源生金、让村民共享、让文化可持续”的目标。这不仅为古生村等洱海流域村落提供了治理样本,也为中国西部及东南亚类似生态文化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启示与实操路径。

5.4. 构建“区域公共品牌+企业子品牌”的双品牌协同体系

为推动农耕文化资源的系统化开发与高质量输出,有必要构建“区域公共品牌+企业子品牌”相结合的双品牌

体系,实现整体形象与个体产品的互为支撑、协同增效。^[14]

一是打造区域公共品牌:“苍洱农耕”可作为洱海流域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区域品牌,围绕大理独特的自然生态与人文历史,整合徐霞客文化遗迹、白族三道茶礼仪、农耕祭祀习俗等文化符号,塑造具有辨识度的文化IP形象。该品牌不仅是产品与服务的“总标签”,更是区域文化内涵的传播载体,贯穿于农产品包装、旅游标识、节庆活动、研学内容等各个维度,提升游客整体体验的认知黏性与情感联结。

二是培育企业子品牌:在“苍洱农耕”公共品牌之下,鼓励本地企业和合作社发展特色化、标准化的子品牌,如“苍洱留香”生态农产品系列(以古生村香米、有机茶叶、传统酱料等为代表),强调生态种植、原产地溯源和非遗工艺传承;同时打造“云霞客”农耕研学线路品牌,结合“霞客足迹”与洱海环线地理特征,设计以农事体验、非遗技艺、生态科普为核心的深度游学路线。通过区域品牌的背书与子品牌的差异化运营,构建横向统一、纵向多元的品牌梯队体系,实现农文旅融合的“产品化—市场化—文化化”转型。

三、推动中泰乡村合作:打造国际化农耕文化走廊:在国际合作层面,可借鉴中国—东盟数字农业论坛机制,积极推动大理古生村与泰国黎敦山建立“姊妹乡村”合作关系,共同打造“中泰农耕文化走廊”,实现跨国文化共创与生态文明共建。具体可从以下几个路径推进:

互设展销窗口:在大理与清迈分别设立“中泰农文旅体验中心”,集中展示双方的代表性农产品、文创商品与非遗技艺,开展联合品牌推介、市场洽谈与体验式销售,打通文化认知与消费转化的链条。

联合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以“苍洱湖区梯田灌溉系统”与“黎敦山森林农业综合体系”为基础,联合申报全球农业文化遗产项目,提升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与政策资源获取力,同时赋予区域品牌更高的文化与生态附加值。

开通“清迈—大理”农耕文化旅游直通车:依托已有航空与旅游线路,设计跨国深度游产品,以“农耕文化、民族风情、生态保护”为主题,推出“霞客东游”“黎敦体验”等主题研学团、摄影团与高端定制旅行,吸引国际客群体验两地农业文明的异同与融合。

共建数字农业协同平台:整合中泰在智慧农业、农产追溯、文旅数字化等方面的优势,建设“中泰农耕数字创新基地”,共享农产数据信息、智慧农具成果与市场流通平台,推动标准互认、认证协作与技术互通,实现品牌国际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双向加持。

6.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云南大理古生村与泰国农耕文化旅游实践的比较分析,系统揭示了农耕文化与文旅融合发展的多元路径与可持续机制。古生村依托“科技小院—文化活化—生态保护”三位一体模式,有效破解了洱海治理政策背景下的生计转型难题,展现了生态约束下的地方性发展韧性;而泰国以创意农业与社区自主运营为特色,通过“文化+设计+科技”激活农耕资源,赋予传统农业新的经济与社会功能。

两地的成功经验表明,农文旅融合若要实现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协同转化,需满足以下三项基本前提:其一,生态价值转化需依赖技术创新支撑;其二,文化传承必须与现代市场逻辑相结合;其三,社区参与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这些共性经验不仅为洱海流域乡村提供了实践范式,也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现实参照。^[15]

基于以上研究发现,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推动政策机制创新

设立“农耕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专项基金”,优先支持环洱海地区开展“土地复合利用”试点,探索生态红线外农房在合规前提下改造为生态民宿的灵活机制。制定《农耕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将白族绕三灵仪式、稻田养鱼轮作体系等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实现从“文化认知”到“制度保障”的转化。

2. 加快数字与技术赋能

建设“古生村数字孪生平台”,集成环境监测、游客流量控制、非遗文化展示与产业运行数据管理等功能,提升管理效率与游客体验。引入泰国稻田GPS作图技术,在洱海生态缓冲带试点建设“生态农业艺术区”,以农业种植结合艺术景观,兼顾面源污染防控与旅游吸引力双重目标。

3. 强化文化传承激励机制

实施“非遗传承人振兴计划”,对掌握三项以上传统手工技艺的村民给予每人每2000元生活补贴,建立传统技艺“在地传承”与“新生力量”共同成长的激励机制。参考泰国 Doi Tung 发展模式,在大理设立“白族工匠学院”,系统开展刺绣、扎染、银饰等非遗工艺培训,并与现代设计、高校资源对接,打造“白族元素+现代美学”的特色文创产品体系。

4. 深化区域与国际协作

依托中老铁路与澜湄合作机制,开通“清迈—古生村”农耕文化旅游专列,联动打造“白族火把节+泰国水灯节”跨国节庆品牌。推动中国徐霞客研究会与泰国皇太后基金会达成战略合作,联合建设“中泰农耕文化国际研学基地”,在青年交流、非遗传播、生态教育等方面开展常态化互动,形成“研学+体验+传播”融合发展的国际平台。

农耕文化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对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当代表达,更是推动乡村实现生态保护、文化复兴与经济振兴协同发展的战略路径。古生村与泰国黎敦山的实践表明,当稻田成为艺术画布、木屋化为文化展厅、农夫转身为知识导师,农耕文明便在现代旅游场域中重获新生。这一融合过程,不仅实现了经济收益与生态价值的平衡,更在全球化语境下守护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地方性认同,为全球湖泊生态区与文化景观村落的可持续转型提供了“苍洱经验”与“东南亚智慧”。

参考文献

- [1] 傅志强,罗蓉.(2024).基于村落传统文化视角的乡村振兴路径研究——以云南大理古生村为例.艺术研究前沿,6(11),9-15.
- [2] 明庆忠,周玉林.基于地缘视角的边境跨境旅游的合作与发展——云南财经大学旅游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明庆忠教授访谈[J].社会科学家,2019(11):3-10.

- [3] 陈丁, 卢山冰.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泰FDI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 [J]. 河北学刊, 2016(4): 130—134.
- [4] 徐少辉, & 董丽萍. (2022). 云南省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与旅游激活研究. 资源与生态学报, 13(5), 851-859.
- [5] 李璋, 刘哀宇. 景村融合模式下边疆少数民族村落建设探究——以大理周城村为例 [J]. 中国民族美术, 2022 (2).
- [6] 贺俊, 程锐, 刘庭. 金融发展、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 [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02): 139-148.
- [7] 洪子燕, 杨再. 从黄土高原的历史变迁讨论种草种树和生态产品的转化问题 [J]. 豫西农专学报, 1985(01): 70-76.
- [8] 黄如良. 生态产品价值评估问题探讨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03): 26-33.
- [9] 赖叔懿, 陈华芳. 生态旅游资源的价值评价与最优开发路径选择 [J]. 生态经济, 2007(02): 96-98+101.
- [10] 蓝虹. 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J]. 中国生态文明, 2017(05): 28-30.
- [11] 何德旭, 程贵. 绿色金融 [J]. 经济研究, 2022, 57(10): 10-17.
- [12] 和秀星. 实施“绿色金融”政策是金融业面向21世纪的战略选择 [J]. 南京金专学报, 1998(04): 22-25.
- [13] 金媛媛, 王淑芳.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生态旅游产业与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 [J]. 生态经济, 2020, 36(01): 138-143.
- [14] 郭来喜. 中国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的基石 [J]. 地理科学进展, 1997(04): 3-12.
- [15] 何爱红, 王亦龙, 寇博轩. 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开发模式选择探讨 [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2, 28(07): 647-649+653.